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

高等教育与人才集聚两种投入对 区域经济增长的共轭驱动研究

——以江苏、浙江两省为例

刘 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

高等教育与人才集聚两种投入对 区域经济增长的共轭驱动研究

——以江苏、浙江两省为例

刘 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等教育与人才集聚两种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共驱驱动研究：以江苏、浙江两省为例/刘林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8523 - 0

I. ①高… II. ①刘… III. ①高等教育—关系—区域经济—经济增长—研究—中国 ②人才资源开发—关系—区域经济—经济增长—研究—中国 IV. ①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668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195 千字
定价 5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创新语境中努力引领先锋学术

(总序)

任 平*

2013 年江苏师范大学文库即将问世，校社科处的同志建议以原序为基础略做修改，我欣然同意。文库虽三年，但她作为江苏师大学术的创新之声，已名播于世。任何真正的创新学术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大学是传承文明、创新思想、引领社会的文化先锋，江苏师大更肩负着培育大批“学高身正”的师德精英的重责，因此，植根于逾两千年悠久历史的两汉文化沃土，在全球化思想撞击、文明对话的语境中，与科学发展的创新时代同行，我们的人文学科应当是高端的，我们的学者应当是优秀的，我们的学术视阈应当是先锋的，我们的研究成果应当是创新的。作为这一切综合结果的文化表达，本书库每年择精品力作数种而成集出版，更应当具有独特的学术风格和高雅的学术品位，有用理论穿透时代、思想表达人生的大境界和大情怀。

我真诚地希望本书库能够成为江苏师大底蕴深厚、学养深沉的人文传统的学术象征。江苏师大是苏北大地上第一所本科大学，文理兼容，犹文见长。学校 1956 年创始于江苏无锡，1958 年迁址徐州，1959 年招收本科生，为苏北大地最高学府。60 年代初，全国高校布局调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指示：“徐州地区地域辽阔，要有大学。”学校不仅因此得以保留，而且以此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得到迅速发展。在 50 多年办学历史上，学校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先后涌现出著名的汉语言学家廖序东教授，著名诗

* 任平，江苏师范大学校长。

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吴奔星教授，戏剧家、中国古代文学史家王进珊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吴汝煜教授，教育家刘百川教授，心理学家张焕庭教授，历史学家臧云浦教授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人文学者。50多年来，全校师生秉承先辈们创立的“崇德厚学、励志敏行”的校训，发扬“厚重笃实，艰苦创业”的校园精神，经过不懈努力，江苏师大成为省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2012年，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更名并开启了江苏师范大学的新征程。作为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全国首批有资格接收外国留学生的高校，目前有87个本科专业，覆盖十大学科门类。有26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和150多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并具有教育、体育、对外汉语、翻译等5个专业学位授予权和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以优异建设水平通过江苏省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单位验收。学校拥有一期4个省优势学科和9个重点学科。语言研究所、淮海发展研究院、汉文化研究院等成为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文化创意为特色的省级大学科技园通过省级验收并积极申报国家大学科技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在内的一批国家级项目数量大幅度增长，获得教育部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多项。拥有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一批高端人才。现有在校研究生近3000人，普通全日制本科生26000余人。学校与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20余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友好合作关系，以举办国际课程实验班和互认学分等方式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接收17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来校学习。学校在美国、澳大利亚建立了两个孔子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学校已向社会输送了十万余名毕业生，一大批做出突出成就的江苏师范大学校友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今日江苏师大呈现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交相辉映，基础研究、文化产业双向繁荣的良好格局。扎根于这一文化沃土，本着推出理论精品、塑造学术品牌的精神，文库将在多层次、多向度上集中表现和反映学校的人文精神与学术成就，展示师大学者风采。本书库的宗旨之一：既是我校学者研究成果自然表达的平台，更是读者理解我校学科和学术状况的一个重要窗口。

努力与时代同行、穿透时代问题、表征时代情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本书库选编的基本努力方向。大学不仅需要文化传承，更需要创新学术，用心灵感悟现实，用思想击中时代。任何思想都应当成为时代的思

想，任何学术都应当寻找自己时代的出场语境。我们的时代是全球资本、科技、经济和文化激烈竞争的时代，是我国大力实施科学发展、创新发展、走向中国新现代化的时代，更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推动更加公正、生态和安全的全球秩序建立和完善的时代。从以工业资本为主导走向以知识资本为主导，新旧全球化时代历史图景的大转换需要我们去深度描述和理论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遭遇时空倒错，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时出场，因而中国现代性命运既不同于欧美和本土“五四”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同于吉登斯、贝克和哈贝马斯所说的西方（反思）的新现代性，而是中国新现代性。在这一阶段，中国模式的新阶段新特征就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欧洲共识”甚至“圣地亚哥共识”，而是以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生态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道路。深度阐释这一道路、这一模式的世界意义，需要整个世界学界共同努力，当然，需要本土大学的学者的加倍努力。中国正站在历史的大转折点上，向前追溯，五千年中国史、百余年近现代史、六十余年共和国史和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史的无数经验教训需要再总结、再反思；深析社会，多元利益、差异社会、种种矛盾需要我们去科学把握；未来展望，有众多前景和蓝图需要我们有选择地绘就。历史、当代、未来将多维地展开我们的研究思绪、批判地反思各种问题，建设性地提出若干创新理论和方案，文库无疑应当成为当代人的文化智库、未来人的精神家园。

我也希望：文库在全球文明对话、思想撞击的开放语境中努力成为创新学术的平台。开放的中国不仅让物象的世界走进中国、物象的中国走向世界，而且也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阔胸襟让文化的世界走进中国，让中国精神走向世界。今天，在新全球化时代，在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强力推动下，全球核心竞争领域已经逐步从物质生产力的角逐渐次转向文化力的比拼。民族的文化精神与核心价值从竞争的边缘走向中心。发现、培育和完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优秀的思想观念、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成为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自立、自强、自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路径和精神保障。文化力是一种软实力，更是一种持久影响世界的力量或权力（power）。本书库弘扬的中国汉代精神与文化，就是培育、弘扬这种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对世界有巨大穿透力和影响力的本土文化。

新全球化具有“全球结构的本土化”(glaocalization)效应。就全球来看,发展模式、道路始终与一种精神文化内在关联。昨天的发展模式必然在今天展现出它的文化价值维度,而今天的文化价值体系必然成为明天的发展模式。因此,发展模式的博弈和比拼,说到底就必然包含着价值取向的对话和思想的撞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三种发展模式,分别发生在拉美国家、俄罗斯与中国,具体的道路均不相同,结果也大不一样。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支撑下的发展模式,它给拉美和俄罗斯的改革带来了严重后果,替代性发展价值观层出不穷。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证明了这一模式的破产。1998年4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但是,“拉美社会主义”至今依然还没有把南美洲从“拉美陷阱”中完全拔出。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论出发的“欧洲价值观”,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这一价值并没有成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有效防火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因此,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①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5月发表的论文中,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概括为“北京共识”。通过这种发展模式,人们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②。不管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G2”之一的中国如何,人们不可否认“中国经验”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必然包含着中华民族自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合发展的共同体主义。而它的文化脉络和源泉,就是“中国精神”这一理想境界和精神价值,与努力创造自己风范的汉文化精神有着不解之缘。文库陆续推出的相关著作,将在认真挖掘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与世界各种文化对话中努力秉持一种影响全球的文化力,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增添一个窗口。

文库也是扶持青年学者成长的阶梯。出版专著是一个青年人文学者学术思想出场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他学问人生的主要符码。学者与著作,

① 《香港商报》2003年9月18日。

② 《参考消息》2004年6月10日。

不仅是作者与作品、思想与文本的关系，而且是有机互动、相互造就的关系。学者不是天生的，都有一个学术思想成长的过程。而在成长过程中，都得到过来自许许多多资助出版作品机构的支持、鼓励、帮助甚至提携和推崇，“一举成名天下知”。大学培育自己的青年理论团队，打造学术创新平台，需要有这样一种文库。从我的学术人生经历可以体会：每个青年深铭于心、没齿难忘的，肯定是当年那些敢于提携后学、热荐新人，出版作为一个稚嫩学子无名小辈处女作的著作的出版社和文库；慧眼识才，资助出版奠定青年学者一生学术路向的成名作，以及具有前沿学术眼光、发表能够影响甚至引领学界学术发展的创新之作。我相信，文库应当热情地帮助那些读书种子破土发芽，细心地呵护他们茁壮成长，极力地推崇他们长成参天大树。文库不断发力助威，在他们的学问人生中，成为学术成长的人梯，学人贴心的圣坛，学者心中的精神家园。

是为序。

2011年2月28日原序

2013年11月5日修改

共轭：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新探索

(序)

刘林的博士学位论文《高等教育与人才集聚两种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共轭驱动研究——以江苏、浙江两省为例》即将出版，嘱我写序，我应允之。其中原因并非我是他博士阶段学习的导师，而是我对刘林的研究领域仍然抱着十分浓厚的兴趣，我把这篇序视为与刘林再次进行的学术对话。

在对刘林这部著作进行解读之前，有必要再现一下我与他的学术交往史。学术交往史的再现并非“无意义”，它是我们两人成为“学术伙伴”的基石，也是刘林这部著作得以完成乃至面世的前提。

因同城之缘，我与刘林认识较早，尽管年龄上不是处于同一年代，但刘林的学术悟性和学术追求使我对他印象颇佳，最终我们如愿成为“师徒”。

刘林自20年前进入徐州师范大学（今江苏师范大学）学习以来，一直不停地进行学习，给自己“充电”。其间，先后获得徐州师范大学理学学士学位、苏州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持续的学习，不仅使刘林具备比较扎实的数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功底，而且提升了他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特别是读博期间，“恶补”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关的知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学术研究“价值理性”的“短板”，使学术研究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渐趋“共轭”。

刘林在大学里属于管理人员，日常管理事务繁杂，但他挤时间读书，并围绕自己确定的研究领域艰辛探索，取得了比较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论文，主持了多项部省

级研究课题。在大学越来越社会化、行政化的当下，能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实属不易。

下面说说刘林博士论文研究方向的缘起。

2009年，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制度学视域下当代中国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共轭机理研究”获批；2011年，我主持的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机理研究”获批。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社会对大学关注的焦点已经由“双轨制”、人才培养质量转移到大学行政化上。我的研究课题切合了当时学术界的热点。围绕这一方向，我组织了多次学术沙龙，在《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10期）等刊物上发表了《大学“被行政化”与“去行政化”》、《基础理论与管理实践的融合——论大学学术组织研究中要正确处理的若干关系》、《大学治理中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研究的再研究——基于共轭的视角》等文章。在我的指导下，我的博士生郭莉也以《当代中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轭机理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刘林在苏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学的是教育经济学，曾经运用数学模型研究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发表过一些研究论文，并主持过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青年课题“长三角两省一市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比较研究”。他数学功底很扎实，加上在苏州大学进行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训练，在读博士后，很快捕捉到了“共轭”在教育经济、教育管理研究领域中的学术价值。也就在读博的当年，他就申报并获批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高等教育与人才集聚两种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共轭驱动研究——以江苏、浙江两省为例”，并决定以此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此后，他一直在“共轭”的领域孜孜求索，研究成果不断。其研究成果《高等教育和人才集聚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共轭驱动研究——以江苏、浙江两省为例》（发表在《经济地理》2013年第11期），获得2013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应用精品工程奖”优秀成果一等奖。现在，他又将研究的目光转向

资源共轭配置上，主持了2015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常态下高等教育资源的共轭配置研究”。可以说，刘林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有着扎实的研究基础和系统的思考的。

谈到博士学位论文的确定，刘林自己这样说：“着迷于丁三青老师博士沙龙热议的‘共轭’思想，结合本人的学习和研究兴趣，2011年申报并获批教育部项目1项。经过导师组同意，最终确立了‘高等教育与人才集聚两种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共轭驱动研究——以江苏、浙江两省为例’这一博士论文选题。”

客观地说，这一研究方向不仅新颖，而且难度大，要驾驭它并非易事。刘林尽管很有韧劲，但刚开始时，还没有入门，特别是偏执于工具的使用，忽视了理论的研修。他在我的学术沙龙上曾经专门进行了两次主讲，暴露出了他学术研究中的“软肋”。

2011年9月17日，在第29期沙龙上，刘林作了题为《高等教育对江浙两省经济增长率贡献的比较研究》的报告。大家对刘林的报告进行了十分热烈的研讨。我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首先肯定了刘林用数学的工具来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但同时我也指出，数学工具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一切社会问题，数学作为一种思维工具、研究工具，它有精确化的地方，但是，这种精确化也往往有它的局限性。具体到刘林报告的这篇论文，我承认它有很好的研究基础，有对数据进行分析的依据。但存在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宏观上说，第一，问题意识和研究的方法。我认为，方法论对于学术研究非常重要。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很重要。我们国家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欠缺的，文理之间的隔膜比较大。用数学方法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可以避免一些弊端，如先入为主、大而化之等，文理结合可以做到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但是，研究者对研究工具本身的价值判断同样很重要。学术研究绝不能做两件事：一是“为观点而观点”。比如说历史学研究中的“史从论出”，先有个论点，然后去找各种史料去论证这个观点，这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研究，是伪科学的。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病。二是“为工具而工具”。比较典型的

有两个：一个是数学；另一个是心理学。当然，不同学科有不同学科的特点。但是，只要我们进行学科交叉研究，要用数学工具进行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就不能出现上面这两个误区，工具就是工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第二，就高等教育对江浙两省经济增长率贡献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本身来说，我觉得，如果进行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双向互动研究，可能会比较好，也可以避免工具主义的毛病。高等教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经济增长则是更复杂的体系，二者的互动就尤为复杂。这就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才能驾驭。

第三，这篇文章首先应该有个理论假设，数学工具是为了验证这个理论假设的。然后按照这个工具把涉及的影响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双向互动的相关因子找出来，把权重影响比较大的找出来，权重比较小的排除掉。至于影响因子问题，高等教育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互动的影响因子有很多，但文章中涉及的主要是人力资源。比如，一个区域高等教育投入有多少、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直接服务于本地的有多少？教育投入之后，其未来的产出会有多少？再一个就是人口的流动，比如，一个人在江苏受到的高等教育，但是毕业后不一定服务于江苏。这里面有人才政策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产业形态问题。另外，还有政府管理体制问题。比如，徐州和临沂相比，人们经常讲，“徐州的管理，临沂的市场”，为什么？由于徐州管理体制问题，市场发育就不如临沂。徐州人均科技人才在江苏排第二，但是，徐州的整体经济发展程度在江苏只能排中等。所有这些，都可能带来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效果的差异。所以，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不能仅仅引用数学公式。否则，就陷入工具理性的窠臼，必须要做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共轭。

2012年10月5日，在第42期学术沙龙上，刘林作了题为《区域高等教育投入与人才集聚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共轭驱动研究——基于江苏、浙江两省数据的实证分析》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他研究的深化。报告引起大家更热烈的讨论。综合大家的讨论，我认为，刘林的研究仍然没有克服工具理性问题。区域高等教育投入和人才集

聚的投入，这两种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多种理解。这篇文章数理逻辑很严谨，但缺乏理论依据。所阐述的理论只限于简单的理解。比如，人才集聚投入，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培养多少人，还包括人才的引进。具体到实证方面，比如徐州市，人均高等教育的百分比，还是比较高的，大学很多，江苏很多城市没法和徐州比，但是，徐州的经济发展仍然属于欠发达地区，很说明问题。徐州的高等教育机构很多，培养的大学生很多，但是，人才集聚是很弱的，这与徐州的经济发达程度、现行政策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是密切相关的，数学模型是说明不了这些问题的。因此，必须先有理论研究，再用模型论证。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肯定相关，如何说明直接相关的因子、间接相关的因子，权重多大，太复杂了，不是用简单的数学模型就能说明白的。

另外，文章涉及三个关键因素：高等教育投入、人才集聚投入和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相互都有共轭关系，并且三个因素中两两之间又是共轭，这里面发生的共轭就多了。高等教育投入是否也应该包括人才集聚投入？应该包括。当然，人才集聚投入与高等教育投入又有区别，二者对经济增长的效益也有区别，不能简单类比。

这里，还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比如，人才引进或人才集聚对经济的贡献率问题。对于人才，还要看集聚的是什么人才。比如，工程类、经济类等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人才的引进，对地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可能会很大，贡献率也会很快就能显现出来。但有些领域的人才，比如人文学科的人才集聚，可能不会很快就对当地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未来影响会很大。像苏州大学的医学，集聚很多人才，对苏州的医药产业可能不会很快产生影响，但10年后对苏州的医学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肯定有很大的影响。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数学公式能够表达出来的。

经过不断的研讨、砥砺，刘林渐入佳境。正如他本人所言：“由于本人理科思维重，人文功底薄，丁三青老师严格要求我尽最大努力地扩大阅读量，改变研究的工具理性主导倾向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共轭’。刚开始对老师的教导还有着不解与不服，但

随着阅读量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发现自己学术研究上的缺陷与不足。论文创作过程中，大量的苦读在短期内虽很难让我驾驭选题，但思路确实越来越清晰了。”

该谈一下对刘林这部著作的看法了。

这部著作是刘林对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完善而成的。作为刘林的导师、“学术伙伴”，他的学位论文我多次研读。现在，再读他的书稿，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总体认为，这是一部对教育经济学领域进行新探索的著作，甚至可以说是创新性研究的成果。

一是研究视角创新。

该书将“共轭”引入教育经济学领域，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轭”、“共轭”，对于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是比较陌生的概念。“轭”，原是指驾车时套在牛颈部的人字形器具，通过“轭”将拉车的牛和车组合成一个系统，牛通过“轭”必须协调一致才能使整个牛车按照人们的意愿前行。在这里，“轭”实际上具有束缚和控制的含义。从哲学上讲，“轭”其实就是一种联系，是某一系统运动过程中既不可或缺又相互博弈的内部成对要素之间的一种联系；“共轭”就是按照一定的规律使“共轭要素”相匹配。“共轭”是包含“共轭要素”和“轭”的一种组合状态，即“共轭状态”。而“共轭”的本意，就是指两头牛通过牛背上的“轭”使它们同步行走。刘林指出，共轭是系统整体性和相关性的内在表现，是系统自组织的原动力之一；共轭状态下的共轭要素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它可以使整个系统结构相对稳定、整体功能协调、对环境适应性强。

“共轭”这一概念的使用，最早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主要是用来表示对称、平衡、稳定等自然属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涉及共轭的研究成果很少，系统研究共轭理论的文献更不多见。正如刘林所说：“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共轭理论阐述尚不够系统。即使有试图系统论述共轭理论的尝试，也显得不够深入与精致。比如‘轭’、‘共轭’、‘共轭系统’、‘共

轭效应’等概念体系尚未建立；共轭特征的提炼与概括还不够准确，论述也略显粗糙。作为具有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的‘共轭’理论，有必要更加系统地、深入地进行理论梳理与应用延伸。有理由相信，共轭理论及其应用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记得2009年我在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时，受自然科学“共轭”概念的启发，运用“共轭”原理研究制度学视域下当代中国大学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当时，我的致思思路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研究前提，从制度学、组织行为学、共轭原理等出发研究大学组织治理中的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的关系。在考察了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后发现，大学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存在着共轭关系。基于大学的基本属性和职能，我提出，当代大学治理已经不是强调学术力量还是行政力量的问题了，而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平衡点，即二者之间的共轭关系。制度学告诉我们，在现代大学利益格局下，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只有在大学治理的秩序和规则中才有其各自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余地。而组织行为学则提出，组织中个体或群体的行为都是有其目的的，各种动机和目的在一个组织中往往造成冲突，而冲突的解决就是在一种“相互妥协”下达成的，它们处于一种共轭关系之中。关键是找到一种平衡点，不同的平衡点造成不同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就是共轭原理。在此基础上，我给出了大学组织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模型：

$$f = tx + (1 - t)y, t \in [0, 1]$$

其中， x 为学术力量， y 为行政力量， t 为参数，影响 t 值的因素包括制度、学校历史、学校文化等诸方面。

理想的 t 值应该是“黄金分割点”，即 $t = 0.618$ 。但在实际的大学治理中，我认为， t 值往往会偏离这个值，达到一个实践中的均衡。我的博士生郭莉基本上以我的教育部课题作为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中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轭机理研究》中，尝试对共轭理论进行了初步阐述，提出了共轭的内涵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将共轭用来阐释大学学术权

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她认为：“从哲学来讲，‘轭’其实就是一种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有条件的。……‘共轭’是按照一定规律联系着的一对事物，而且这对事物通过一定的规律协调对称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得整个系统结构相对稳定、要素联系紧密、整体功能协调、对环境适应性强。……共轭是有序之本，共轭机理是事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

刘林运用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特别是管理学理论中“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等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共轭的概念体系、共轭的基本特征、共轭的价值及共轭理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应用的适切性，这就为研究高等教育与人才集聚两种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共轭驱动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视角工具。

他在对共轭进行定义的基础上对共轭的特征做了新的概括：普遍性与多样性、依存性与对称性、动态性与平衡性（郭莉的概括是对称性、传递性和规律性）。并且，他对“共轭系统”、“共轭驱动”、“共轭效应”等相关概念也进行了界定。认为，“共轭系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共轭系统是指由共轭要素和轭组成的集合，共轭要素通过轭相互关联；广义的共轭系统是指包含共轭要素的集合，即除共轭要素、轭等要素以外，还有其他相关联的要素，是一个“扩大了”的集合。并且，狭义的共轭系统仅可以被看作是广义共轭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在实际生活当中，人们研究与实践的共轭系统往往是广义的。“共轭驱动”是指共轭要素自组织原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共轭效应”是指共轭要素共轭驱动系统发展所产生的效果。他指出，共轭强调系统的稳定性，而非系统发展的速度。然而事实上，在共轭系统中，共轭要素共轭驱动的目标是使整个系统发生内耗减少、系统更趋稳定有序的共轭效应，大多数时候这种共轭效应往往表现为系统发展不但速度较快，而且稳定有序。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刘林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与使用不盲从，始终保持学术的“警惕性”，注重新理论、新方法移植的“适切性”，而不是追求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一方面，他积极尝试学科的交叉融合，比如，共轭在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关注的现象，如高等教育、经济增长等，具有非线性、不可逆性、偶发性等特征。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当中共轭现象无处不在，共轭形态林林总总。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有很多又可以用共轭的视角来认识，用共轭的方法来解决。共轭远远超过了现有学科的认识与应用，具有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意义之上的一般概念特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对共轭的关注，说明共轭理论在科学研究的大分化大融合时代使这一领域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虽然尚处在起步阶段，但呈现出快速升温的态势。共轭理论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具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哲学意义。现有的文献为人们提出了共轭的内涵、共轭的特征等理论轮廓，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为共轭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开启了一扇大门，这是具有质变性质的事件。”

另一方面，他对共轭在高等教育管理学领域的运用又持审慎的态度，谨防硬性移植而产生“水土不服”。他说：“通过对教育经济学具体研究视角的创新，使我们的教育经济学研究活动自觉面对复杂的巨型系统，实现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整合。共轭视角是一种包容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共轭，是有序和无序的统一、必然和偶然的结合。共轭不是能够用简单的方式来加以确定并取代简单性的。当然，我们在研究与实践中引入共轭视角并不是为教育经济学研究找寻出一个万用的法宝和金科玉律，须知共轭也只是人类认识长河中的一个涟漪而已，如果认为它是一个认识的尽头，这个观念本身就是非共轭的。经济增长活动中与高等教育投入对应的共轭要素的挖掘，这对共轭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这对共轭要素如何驱动经济增长，只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种别样的方法，它无法否定已有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成功之处，我们的头脑一定要保持警醒。”这个观点所体现出的学术态度、科学精神值得点赞。

二是分析了高等教育与人才集聚两种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共轭驱动机理。